

宋元“字义体”发展述略

许至

(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字义体”是宋元理学家以“四书”为源,凝练出若干性理范畴并加以解释的集合体。它肇端于诗歌体的《训蒙绝句》,发展于仿蒙求体的《性理字训》,成熟于字典体的《北溪字义》,最后又回归到传统注疏体的《读书记》,整体呈现出启蒙初学、理学入门到学术研究的演变轨迹。这种以范畴勾勒四书学或理学的通俗化诠释形式,在庞杂的理学思想中提取核心奥旨的诠释方法,既打破了汉唐传注家法的僵化局面,又凸显了儒学革新中典型概念的精义,而且以一种活泼的诠释形态为儒家经典诠释、理学范畴阐释、儒学通俗化的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与思路。

关键词:字义体;理学范畴;通俗化;诠释;宋元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3)02-0038-11

朱熹后学程端礼(1271—1345)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下文简称《日程》)中规定了元代孩童八岁前所读书目:“八岁未入学之前,读《性理字训》,日读《字训纲》(程逢源增广者)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1](28)}他所列的三本书,分别为程端蒙(1143—1191)《性理字训》、程若庸(生卒年不详)《字训纲》(即《增广性理字训》)、朱熹(1130—1200)《性理绝句》(即《训蒙绝句》)。同为元代学者的熊大年(生卒年不详)编有《养蒙大训》一书(附于元刊本《小学》之后),它是一本汇编本,又称《集书指意》,其所“集”之书均为宋代理学家的训蒙之作,共计10部^①。上文《日程》所涉及的三书均被收入,其中程端蒙的《毓蒙明训》^②、饶鲁(1193—1264)的《训蒙理诗》与王柏(1197—1274)的《伊洛精义》的体例与前述三书十分相似。朱熹后学陈栎(1252—1335)曾将《性理字训》《增广性理字训》与陈淳(1159—1223)的《北溪字义》、真德秀(1178—1235)的《读书记》一起比较:“《字义》(笔者按:《北溪字义》)

一书玲珑精透,最好启发初学性理之子弟……《读书记》一书,既博且精,凡诸经、诸子、诸史、诸儒之书之所当读当讲者皆在焉……《增广字训》一书,乃因程端蒙之《字训》而充之,亦甚好,会聚前辈之议论,而间出己意以折衷之,但以之启蒙后进,则不如《字义》之活而看。”^{[2](4b)}四本书一同被比较,这本身意味着其内容或体例的相似性,事实也是如此,四本书俱是对“字”的解释集合。细较之,诸书存在难易程度的差别:《性理字训》与《增广性理字训》具有启蒙性质,《北溪字义》用以启发初学理学的子弟,而《读书记》是正统的理学著作,这是“字义体”文本内容由浅至深发展的基本趋向。

综上所述,我们将本文所涉的宋元“字义体”文献大致归纳为:《训蒙绝句》《性理字训》《增广性理字训》《毓蒙明训》《训蒙理诗》《伊洛精义》《北溪字义》《字义》《读书记》等。虽然诸书存在难易程度与解读形式的差异,但整体上具有共通性:其一,诸书都是对“字”的解释,此处的“字”专指理学范畴或概念,即理学字

收稿日期:2022-09-02;修回日期:2022-12-05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儒家经典通俗化诠释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2ZXC005)

作者简介:许至,女,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儒学世俗化,联系邮箱:xuzhipilo@nju.edu.cn

书。同时对“字”的阐释不同于一般的训诂，偏向义理阐释。其二，诸类范畴大部分出自“四书”。《训蒙绝句》是对“四书”诗歌化的诠释，称之为《四书绝句》更为贴切；《北溪字义》又称《四书字义》，甚至有“羽翼《四书章句集注》”之称。可以说，“字义体”是对“四书”以范畴形式解释的另类体例。其三，程端礼与熊大年汇集的“字义体”文本是专为启蒙教育或普及教育而设，故而它们篇幅短小、语言简约、通俗易解，并且采用了如诗歌、仿蒙求体等多种启蒙读物的编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北溪字义》与上述文本相比已经具有学术研究性质，但与一般的理学作品比较，又具有通俗化诠释特征，常被视为“袖珍字典”，本文将会重点论述。而《读书记》则是在“字义体”演变序列中又一次回归到传统注疏中，并不具通俗性，故不在本文重点考察范围内。

当然，哲学意义上的“字义体”早就存在^③，先秦诸子百家各有一套范畴体系，比如孔孟的仁、义、礼、智、勇、信，老子的道、一、无、反，《易大传》的形而上、形而下、太极、阴阳，玄学的有、无，佛教的体用等^{[3](578-590)}。然而，宋元之前对哲学范畴的解释大都分散在哲学专著和儒家经典注疏中。朱熹首先从“四书”中凝练哲学范畴并加以诗化解读，程端蒙、王柏、饶鲁、陈淳、陈普等理学家紧随其后。这类文献因长期处于儒学研究的末端，常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儿书，目前学界对“字义体”的研究稍显薄弱^④。职此之故，本文欲作尝试。

一、《训蒙绝句》：以“七言绝句”解读理学范畴

《训蒙绝句》^⑤是朱熹析取“四书”关键词作为诗题，采用“七言绝句”的形式阐释命题的理学思想诗歌集，共计98首^⑥。从其书名“训蒙”“诗”“绝句”及“性理”诸类字眼可知，它是专以传授蒙童性理知识和思想的诗集。朱熹自序亦可证，“病中默诵四书，随所记以绝句，后以代训蒙者五言七言之读”^{[4](1)}。在朱熹的视野中，当时社会流行和传播的蒙学读物，如《弟

子职》《蒙求》和《千字文》等，并不符合他所期望的道德教化要求。传统儒家经典读物是其理想中的教材，也是打造圣贤坯模的重要依据。然而，学者编写的儒家经典著作是否适合儿童阅读呢？朱熹认为并不适合，在《训蒙绝句》成书前他就曾编写《论语训蒙口义》，因其已佚，只能从其《序》中一探究竟：

予既序次《论语要义》以备览观，暇日又为儿辈读之。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本非为童子设也，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初学者读之，经之文句未能自通，又当遍诵诸说，问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启蒙之要。因为删录，以成此编。……然本其所以作，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故名之曰《训蒙口义》。^{[5](3614-3615)}

与汉唐对经典的繁芜堆砌的训诂疏证不同，宋代诠释更注重文本义理的发挥，然而硕儒对文本与观念的演绎似乎亦不适合蒙童讽诵。朱熹为了让童蒙等初学者能快速有效地研习经典文本和体悟圣贤之道，在《论语要义》(训诂略、义理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加浅显易懂的改编和删录，著成《论语训蒙口义》(由简单的训诂、音读和基本章句含义构成)，而《训蒙绝句》则完全放弃了疏证性的解读，只保留义理。由三书可知，朱熹对“四书”的诠释愈发简明扼要，在对经典的通俗化、启蒙化诠释上不断进行尝试，还采用更为通俗化的手段——七言绝句——加以阐释。

《训蒙绝句》的诗题与一般的咏物抒情类诗歌的题目截然不同，更具知识性和学术性。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独具“四书”特色的命题^⑦，如《鸢飞鱼跃》《就有道而正焉》《十五志于学》《知天命》《吾无隐乎尔》《难言》《勿忘勿助长》《仰思》《乌豢悦口》《牛山》《夜气》《莫知其乡三》《心之官则思》《万物皆备》《观澜》《大而化之》等49题56首。二是凝练的抽象概念29题42首，即本文所涉的理学范畴，具体包括：《天》《太极图》《先天图》《小学》《西铭》《唤醒》《学》《心》《意》《致知》《中庸》《人心道心》《命》《性》《道》《情》《谨独》《静》《体用》《鬼神》《三省》《一贯》《居敬》《克己》《下学上达》《求放心》《动心忍性》《存心》《养性》等。统观诗题，题

旨明确、简洁明快,以一言、二言及三言为主,具有鲜明的“四书”与“理学”色彩。这些哲学概念在“四书”和《四书章句集注》中都是高频名词,如“天”分别出现418次与1095次,“道”出现298次和1021次,“仁”出现280次和758次。值得注意的是,“理”是朱熹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并未单独登场,大概“理”并非“四书”中的核心要旨,然而它在《训蒙绝句》中出现频率达42次,涉及28首诗。其中关于朱熹“理”的基本要点皆有所关涉,试举几例:“浑然气理流行际,万物同根此源”^{[4](5)},论“理”是宇宙之本源,天地万物皆由其产生;“理则无形气是乘,气随夜息理斯存”^{[4](29)},论理气关系,有理便有气,理气不分,但理为根本;“万物当须以理观,不离太极是其源”^{[4](32)},论“太极”是“理”的同义语。其他义、礼、公、私、忠、恕、德等虽未以单独范畴呈现,但行文中皆有阐释。明代谭宝煊(生卒年不详)和清代尤侗(1618—1704)著有同名著作《性理吟》,二书是在《训蒙绝句》基础上凝取另外48个哲学范畴^⑧,并以“七言律诗”进行解读,这是《训蒙绝句》范畴诗化解读在明清的续篇。

直截了当、通俗易懂的诗题,同时按“四书”先后编排^⑨,无疑增加了读者阅读的便捷性和有效性。《训蒙绝句》对理学范畴的通俗化诠释还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以简驭繁,即将庞杂、佶屈聱牙的理学思想化繁为简。具体言之,理学范畴被置于28个字数与韵脚规律的架构中进行诠释,在限定的框架中“填充”学术性的理学知识,对关键词的提取尤显重要。我们以《仁》第二首诗与朱熹其他文集对“仁”思想的相关论述作比较:

心无私滓与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随分而施无不爱,方知仁体盖言公。^{[4](13)}

“仁者人也”,合天下之公,非私于一己者也。盖无公天下之诚心,而任小己之私意,则违道远矣。然“仁者人也”,爱有差等,则“亲亲为大”。^{[6](64)}

盖仁只是爱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则于其所当爱者反有所不爱。惟公则视天地万物皆为一体,而无所不爱矣。^{[7](1-2)}

《仁》诗的四句话主要阐明以下几个观点:(1)心初生状态未经任何私欲之浸染,此心本与天同;(2)人要消除心中所有的私欲,才能实现与天地万物同一;(3)爱虽有差等,但仁指示着爱他人与一切物;(4)人纤毫私欲不存,天地万物一体,仁才彰显无偏无私的“公”的特质,仁体为公。由上述诗文比照可知,《仁》诗毫无疑问沿袭了朱熹在正统理学论著中对“仁”的解释,二者的基本观点、解释立场并无区别。

第二,富有韵律的诗歌与直白浅显的口语化表达,使抽象艰奥的理学范畴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记诵。由于汉字为单音节文字,容易形成整齐的词组或短句并且押韵,故而诗歌成为古代传统启蒙读物编写的重要形式。“七言绝句”兼具押韵和对偶,语言凝练、句式整齐、音韵和谐,能使读者“跃然兴起”。与此同时,行文中还夹杂了诸多口语化的表述,如“其中”“是中”“故曰”“即是”“此是”“兹”“莫教”等日常用语在诗文中随时切换;又如“常须急把理来救”^{[4](8)}、“所以功夫先要静”^{[4](11)}等句也进行了通俗化的加工。

第三,将范畴诠释嵌于生动活泼的图卷中,呈现出空灵有趣的画面感。如“气体苍苍故曰天”^{[4](5)}与“妙合之机不暂停”^{[4](9)}将“天”与“命”的动态关系呈展于读者面前;又如“此理充盈宇宙间,下穷鱼跃上飞鸢。飞斯在上跃斯下,神化谁知本自然”^{[4](12)},将周流于天地间的君子之道以一种活泼的生动态势展现出来;再如“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4](11)},将“曾点言志”的场景描绘成一幅春意盎然的画面。行文中亦采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如“用犹枝叶体犹根”^{[4](12)}解释体用关系;“祇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4](23)}用镜子蒙垢后的复净比喻人克尽私欲后的本性回归。

《训蒙绝句》中的诗歌与宋元之际的理学诗十分相似,而与言物咏志、陶冶情操的传统诗歌不同,它主要阐发格物致知之理。后来朱熹成为理学诗发展最大的推动者。蔡模(1188—1246)曾评价朱熹的理学诗:“三百篇之后,非无能诗者,不过咏物陶情,舒其萧散间雅之趣而已。独朱子

奋然千有余载之后，不徒以诗为诗，而以理为诗。”^{[8](23)}可见理学诗具有“重理轻辞”的特点，深刻的道学义理和畅达悟道之乐才是理学家表达的重点。无怪乎刘克庄(1187—1269)有言：“近世贵理学而贱诗赋，间有篇咏，率是语录、讲义之押韵者耳。”^{[9](207)}简言之，理学诗的旨趣并不在文学价值，而是希冀以简洁明了、易入人心的诗歌宣扬理学观点，进行思想道德教化，编写《训蒙绝句》或许也具有此目的。

除与理学诗相关，《训蒙绝句》还与咏经诗体例颇为相似。咏经诗的产生与咏史诗不无关系，后者主要是针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而作的诗歌，以排比七言绝句为主，动辄百首。它肇端于秦汉，唐代达至繁荣，宋以来各类乡校十分盛行^⑥，咏经诗应运而生。咏经诗形式上仿照咏史诗，内容上由咏叹历史事件和人物转向咏叹儒家经典和儒学人物。当然，咏经诗并非朱熹首创，张载(1020—1077)曾以“诗”解《诗经》十三首，其他还有张九成(1092—1159)的《论语绝句》、林子充(生卒年不详)的《论语诗》、张孝祥(生卒年不详)的《纪孟十诗》、陈普的《四书咏》《毛诗咏》等。脍炙人口的咏经诗有利于儒家经史教育，对经典的传播与普及亦大有裨益。

综上所述，无论《训蒙绝句》归属理学诗抑或咏经诗，其重点均不在咏叹，而在于将抽象艰奥的“四书”名词、性理概念与活泼有趣的诗歌巧妙融合。它以简洁明快的诗题、精心编排的顺序、准确的义理关键词和生动空灵的画面感，为儒家经典释读赋予了生命力，为理学奥义普及注入了活力。

二、《性理字训》：以“仿蒙求体”解释理学范畴

朱熹为“字义体”设置了初步理学范畴框架，指明了简明化的诠释方向。朱熹门人程端蒙以其师的四书学/理学思想为来源，提炼出更具普遍性和典型意义的哲学范畴，并采用更为凝练和规整的“仿蒙求体”进行诠释，为初学者打开了快速理解理学概念之门。从范畴选取上看，《训蒙绝句》以“语孟学庸”原词命题勾勒全文，纯

粹的性理范畴穿插其中，共 29 个；而《性理字训》并不具有“四书”的特色命题与短词，俱以性理相关的 30 个抽象范畴贯穿全文，具体包括：命、性、心、情、才、志、仁、义、礼、智、道、德、诚、信、忠、恕、中、和、敬、一、孝、悌、天理、人欲、谊、利、善、恶、公、私。其中，心、命、性、情、道、仁 6 个概念与《训蒙绝句》重合，“中庸”与“中”、“一贯”与“一”、“居敬”与“敬”具有相似性。从范畴具体诠释来看，《性理字训》的基调依然是通俗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程端蒙将分散在朱熹文集的概念解释用简约语言进行转换，他对范畴的解释几乎是对朱子原意的“复述”。我们从《性理字训》中选取若干哲学名词解释与朱熹的相关论述作对比，具体见表 1。由表 1 可知，程端蒙对概念阐释的基本观点、阐释进路、语词表述与朱熹的解释基本相同。这种“复述”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仅对定义的表达方式作了改动，具体的阐释语词及表达顺序几乎完全一致。当然，朱熹著作中对范畴或概念的解释本身具有明显的下定义特点，如“……者，……也”“谓……”“故谓之”“……之谓也”等。程端蒙则将分散在朱熹解释系统中的范畴择选出来，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采用统一的“是之谓”句式替代。二是在保持朱子对基本名词定义原貌的同时，进行增添、删减与调序。比如：“性”词条中“人所禀受于天”改成“人所禀受”，“浑然至善”改成“莫非至善”，中间舍去“受于天以生之理也”。这种“复述”遵循了“重中之重”与“简之又简”的原则。“重中之重”是指抓住朱熹的性理概念中最为重要、最关键的词汇，并加以调整以编排全文；“简之又简”与抓关键相契合，即以最为简约的语词和句式来表达。《性理字训》总篇幅不过 400 余字，语词表达均是常用词汇，没有生僻字；句式简单，以四字短句(间有六言与七言)为主。可以说，程端蒙对理学概念的诠释并不具有原创性，主要依循了朱熹的理学思想。

第二，程端蒙创造了范畴诠释的新体裁“仿蒙求体”。虽然《性理字训》在义理解释上毫无

表1 《性理字训》范畴诠释与朱熹文集中相关诠释比较

《性理字训》中的概念诠释	朱熹对相关概念的论述
天理流行, 赋予万物, 是之谓命。 ^{[10](232)}	命者, 天理流行、赋予万物之谓也。 ^{[11](840)}
主于吾身, 统乎性情, 是之谓心。 ^{[10](232)}	心也者, 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
人所禀受, 莫非至善, 是之谓性。 ^{[10](232)}	统性情者也。 ^{[12](4989)}
发己自尽, 是之谓忠。	性者, 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 浑然至善, 未尝有恶。 ^{[13](251)}
循物无违, 是之谓信。 ^{[10](233)}	发己自尽为忠, 循物无违谓信。 ^{[13](12)}
无所偏倚, 是之谓中。	其未发, 则性也, 无所偏倚, 故谓之中。
发必中节, 是之谓和。 ^{[10](233)}	发皆中节, 情之正也, 无所乖戾, 故谓之和。 ^{[13](18)}

新意, 但其规整、清晰、简易的诠释形式却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四库全书》对其如此评价: “皆以四字为句、规, 仿李瀚《蒙求》、而不谐声韵, 不但多棘唇吻, 且亦自古无此体裁。”^{[14](805)}我们可从“自古无此体裁”等语句由“贬”看“褒”, 此处“新”不是毫无依凭地创作, 而是模仿了《蒙求》一书的体例。《蒙求》是唐代李瀚(生卒年不详)专门为孩童编写的关于掌故和知识的启蒙课本。以“王戎简要, 裴楷清通。孔明卧龙, 吕望非熊”^{[15](1)}为例, 它采用四字韵文, 每四字为一主谓结构短句, 上下两句构成对偶, 各论一个历史故事。由于“蒙求体”便于童稚诵读与记忆, 故成为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编著的重要体裁之一^①。虽然《性理字训》将“历史掌故”转换成“性理范畴”, 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蒙求体”原本兼具对偶与韵律的美感, 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大众化、启蒙化的性理举要。

朱熹对此书颇为赞赏, 他说: “《小学字训》甚佳, 言语虽不多, 却是一部大《尔雅》。”^{[16](2330)}《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词典, 收录关于人事、生活用器、天文、地理等词汇, 言简意赅, 最短的释意不过两个字, 也被视为古代的启蒙教育读物。朱熹用“《尔雅》”指称《性理字训》, 大抵是强调其直接明了的行文特色, 对于毓养童蒙、普及性理知识都有益处。值得注意的是, 《尔雅》前的限定词“大”, 汪师韩(1707—1774)如此解释: “朱子以大《尔雅》称之, 惟所释乃仁义道德之字。”^{[17](1a)}“仁义道德”是理学乃至传统儒学强调与信奉的关键词, 这或许是朱熹认为《性理字训》更胜一筹的原因。

《性理字训》单独将哲学概念作为统编全文的主线, 并创造了“仿蒙求体”, 这对后来的理学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饶鲁与王柏著有相同体例的《训蒙理诗》和《伊洛精义》, 前者提取了7个范畴, 后者提取了55个(18个与《性理字训》重合)。二书以五言与四言为主, 行文对仗整齐, 夹杂着口语化的表述, “下定义”句式贯穿其中; 语言生动有趣, 又不失学术严谨。可以说, “仿蒙求体”一度成为传播理学的常用形式。

由于《性理字训》在词条的选取上偏重心性和道德, 而如太极、理、气、阴阳等与天道相关的概念则有所偏失。师从黄榦(1152—1221)的程若庸(生卒年不详)对原作进行了修改与增补, 编成《增广性理字训》。此增补篇将原书的30个范畴增至182个, 并将诸概念分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6个门类, 使理学范畴体系更完整和丰富, 此为其一。其二, 程若庸将文本的语言形式进行了统一的调整, 即将原有的四言、六言、七言全部编排为四言, 将由一至四个短句构成的范畴解释全部改为四句, 使全文句式更为整齐和规范。其三, 在原有《性理字训》范畴释意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与完善, 使阐释更为充实与丰富。总之, 程若庸的增补使范畴的提炼更富层次感, 文本句式更具统一感, 概念阐释更有丰富感。朱升(1299—1370)又增加了“善”的概念, 后《增广性理字训》逐渐替代了《性理字训》。

综上所述, 《训蒙绝句》为理学范畴诠释的先导之作, 呈现出以学术为基础的理趣化特征。《性理字训》则为典范之作, 尽管释意上几乎复述了朱熹的论点, 但它为“字义体”普遍意义上

的理学概念设置了选取的范围和边界，同时创立了“仿蒙求体”的新体例，为理学的通俗化发挥了作用。

三、《北溪字义》：以“袖珍辞典”诠释理学范畴

不论是以“七言绝句”诠释范畴的《训蒙绝句》，还是以“仿蒙求体”阐释范畴的《性理字训》，它们都采用了启蒙读物的编著形式，二者的共同特点在于每条概念的诠释篇幅短小、句式工整或富有韵律。但由于受字数、对仗或韵脚的限制，在阐释深奥的理学思想时容易导致义理表述不完善的问题。朱熹与黄榦对此曾有过讨论：

因说正思《小学字训》，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难做。如‘中’只说得无倚之中，不曾说得无过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难做？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18](3676)}

“中”和“仁”是传统儒学思想及理学体系中相当重要的范畴，《性理字训》仅分别以4字及17字诠释，《训蒙绝句》中“仁”为56字，与“中”相似的“中庸”为28字。追求形式的精简和要求内容完备本身存在矛盾与冲突，陈淳的《北溪字义》则弥补了此弊端和缺憾，这是“字义体”从启蒙教育向学术研究发展的转折点。

《北溪字义》(又称《四书字义》《四书性理字义》)是陈淳晚年的讲学稿，由其弟子王隼(生卒年不详)整理而成。此书共选取了26个范畴，分别如下：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太极。其中，与《性理字训》一致的有17个，特别是前5个范畴(命、性、心、情、才)在二书中出现的位置与出场顺序完全相同，这种“巧合”充分说明二书之间的相承关系。然而，《性理字训》与《北溪字义》对理学范畴的诠释方式存在差异，这主要与作者当初设定的目标群体不同相关。《性理字训》和《训蒙绝句》一样，其目标读者为蒙童，故而行文尽量生动有趣、简明扼要，而《北溪字义》的读者大抵是

稍有基础的、初入理学之门的群体，故阅读难度稍大。

众所周知，理学体系复杂，涵盖了大量的经注、语录、讲义及文集，不仅有私人著作，还有官修论著。初入理学之门的读者，面对浩瀚的文献、深奥的义理、复杂的体系，望而却步。朱熹早意识到此问题，淳熙二年(1175)他与吕祖谦(1137—1181)共同编著了理学入门书《近思录》。他在自序中说道：“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19](163)}《近思录》强调“北宋四子”关于理学精要的重要方法，目的是为初学者提供入门的阶梯，然而此书篇幅巨大，共有十四卷，且义理深奥，开篇即为《太极图说》，对于基础薄弱的初学者而言过于艰深。笔者认为《北溪字义》比《近思录》更适合理学入门。陈淳从理学范畴入手，阐释性理概念，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相较于复杂深奥的理学巨著，这部“小作”文字凝练质朴，结构清晰分明，通俗易懂，故被视为初学者“植根基、立标的”^{[20](94)}的理学启蒙教科书。

全书采用一般的学术论述语言，除“才”这个词条字数为360字左右，其他范畴篇幅均在千字以上，由于讲稿本身具有简单清晰的特点，读来并不艰涩。我们试以首个范畴“命”为例，分析《北溪字义》如何将抽象的性理概念进行层层剥解，其基本架构见图1。

“命”只1字，2000余字的阐释却不显臃肿。由图1可知，陈淳对概念的诠释，架构筋骨分明、层层递进、脉络贯通，便于读者有效掌握范畴的大意。诠释共有九段，分为六层：(1)对“命”进行简单的字面定义；(2)从“理”(“五十知天命”)与“气”(“死生有命”)分别阐述“命”的含义；(3)由“气”禀不齐分析造成人与物之命的差异；(4)由“气”禀入手分析人类品类(命)之不同的原因；(5)从造化上(“元亨利贞”)论命；(6)最后设置与命相关的“四问四答”以便深入探讨。由上观之，陈淳将“人”作为“命”之主体，每层紧扣“理”与“气”展开，条理清晰、有理有据，并且结合生活实例进行说明。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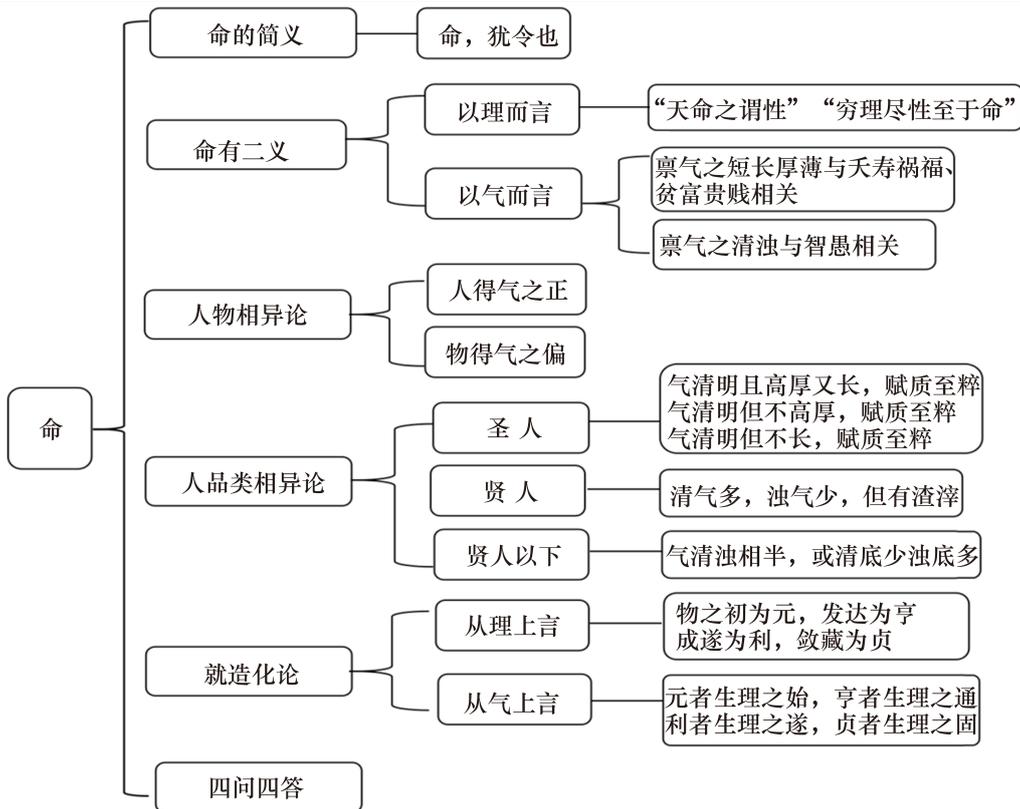


图1 《北溪字义》对“命”的解释架构图

得指出的是，与程端蒙一样，陈淳对理学范畴的阐释主要依据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他对“命”的解释在《朱子语类》卷四中均可找到源头^⑩，不过不如后者详尽。诚如陈荣捷所言：“《字义》一书，是一部朱子思想的最佳结晶，也是新儒家哲学名辞的最佳诠释。”^{[21](326)}

当然，范畴整体架构与清晰的脉络也离不开“技术性”的处理。其一，每个段首开明宗旨，概述本段大意。如“命”第二段开头“命一字有二义：有以理言者，有以气言者，其实理不外乎气”^{[20](1)}，不仅为读者说明此段将从“理”与“气”两个角度解释“命”，也阐明了理气关系。其二，以“引导性”的词句用以承上启下，如“所谓以理言者”^{[20](1)}、“如就气说，却亦有两般”^{[20](1)}等语句。其三，以简短下定义方式作为提示。程端蒙借鉴了《四书章句集注》中的短注，陈淳依旧承袭，比如“曰理是也”^{[20](1)}、“谓之天道”^{[20](1)}、“故谓之固”^{[20](4)}等。概言之，段首大意旨在提示范畴整体诠释框架，引导性词句是为了分解阐释内容，短注定义则可引起读者的初步认知。

同时，全文采用各种修辞手法，使范畴的阐释精炼醒目、形象传神，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针对“人都受命于天，为何实际生活中人的命运却不同”这个问题，陈淳以“种菜”作比喻加以解释：

又譬之治一片地而播之菜子，其为播植一也，而有满园中森森成行伍出者，有掷之蹊旁而践踏不出者；有未出为鸟雀啄者，有方芽为鸡鹅啮者，有稍长而芟去者，有既秀而连根拔者，有长留在园而旋取叶者……其参差如彼之不齐，岂播种者所能容心哉？故天之所命则一，而人受去自是不齐。亦自然之理，何疑焉！^{[20](5-6)}

陈淳连续采用几组排比短句，以大众的日常生活经验为例，种子在播撒、生长与成熟过程中，因受各种人为的、自然的、偶然的、必然的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人亦是如此，虽出生时受命于天，但其一生究竟如何，亦受气禀、造化等因素影响，导致不同的命运。倘若跳出理学概念诠释文献，我们实难想象这竟然关涉艰深晦涩的理学知识，而诸如此类的例子在《北溪字义》中比比皆是。陈淳巧妙运用拟人、

对仗、设问等修辞方法，夹杂在抽象、严肃的概念解析中，增强了行文气势与情感，使静态理论阐释显得真切和生动。

受《性理字训》与《北溪字义》的影响^⑬，陈普(1244—1315)编有相同体例的《字义》，此书编排了153个范畴，基本涵盖了前书所涉及的概念。它的特色之处有二：一是范畴颇具特点，如降衷、秉彝、浚哲、谋、惹良、诚之、密、轨、则、上、睿、是、必等罕见的词条。二是释意上颇具匠心，敢于批判前人。他说：“北溪陈安卿《字义》用文公之说已善，而后段说‘极’字多未当，盖亦未深明也。至于三才则未闻有一语及之者，盖亦熟于口耳而未暇深思。”^{[22](180)}然而，《字义》的语言编排相当不规整，句式长短不一，篇幅不平均(最长的如“天”条竟达400余字，短的如“得”“失”仅2字)；下定义不仅涉及字义，还有音训、同义等；总字数大约为1万字。整体观之，它不如《性理字训》易于启蒙，又不如《北溪字义》具有学术性，但亦是“字义体”发展过程中的一环。

“字义体”发展到《北溪字义》已具备较强的学理性，不论范畴选取的重要性、阐释的准确性、编排的逻辑性，还是思想的深刻性，都远甚于前书。同时，它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也逐渐摆脱了“小儿书”的性质，其以“哲学范畴”架构的逻辑体例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如真德秀《读书记》与朱公迁《四书通旨》等论著都采用性理概念构建全文以诠释“四书”^⑭；官修著作《性理大全》与《性理精义》也以理学概念勾勒全书以普及程朱理学。值得注意的是，笔者认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可能也受“字义体”的影响，从范畴选取上而言，此书凝练的8个范畴中理、性、才、道、诚与《北溪字义》完全一致，“仁义礼智”与“仁义礼智信”、“权”与“经权”十分相近，“天道”为其独有。可以说，《孟子字义疏证》受《北溪字义》影响的可能性很大。二书的差异有两点：一是《孟子字义疏证》诠释远不如《北溪字义》那般结构清晰、通俗易懂。二是著书的立场完全不同，戴震是为批判程朱理学对社会造成的流弊而作，本质上属于反理学阵营；而陈淳持理学思想，以护教态势呈现。其他

如阮元(1764—1849)的《论语论仁论》、陈澧(1810—1882)的《汉儒通义》、黄以周(1828—1899)的《经训比义》、刘师培(1884—1919)的《理学字义通释》等书，均以哲学范畴解释建构全文。虽然诸书的概念选取各有侧重点，但内容上具有重合性；阐释风格上也非通俗化，义理解释与训诂兼有；其中亦有“反理学”立场。以上著作的范畴选取范本未超出“四书”序列，也有对其他儒家经典范畴解释的文本，如惠栋(1697—1758)的《易微言》、周家禄(1846—1909)的《三礼字义疏证》、冯振心(1897—1983)的《老子字义》等。

美国学者J.A.塔克教授认为《北溪字义》是东亚最早的哲学辞典^{[23](46-51)}，并且直接影响了早期日本哲学辞典的编写。自16世纪90年代《北溪字义》传入日本之后，学者林罗山(1583—1657)将其改编成《性理字义谚解》，对于仅知少量汉字的日本人而言，更易理解与掌握理学知识。后山鹿素行(1622—1685)的《圣教要录》、伊藤仁斋(1627—1705)的《语孟字义》与荻生徂徕(1666—1728)的《弃名》等书，在文本体例、范畴选取、解释风格上皆受《北溪字义》影响。以上是“字义体”对日本哲学辞典编写的影响。

四、结语

宋元“字义体”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著作，与理学本身有何关系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其一，将“字义体”文献置于整个宋代理学家构建的小学(启蒙)教育系统中去考察。据笔者粗略统计与归纳，宋代理学家编著的通俗类教育读物可分为道德类、理学类、经学类、历史类等8大类50余本^{[24](29-52)}，“字义体”属于理学类。整个宋代通俗类的启蒙读物类型开历史之最，这与理学家的努力推动分不开^⑮。当然，朱熹倡导小学教育理念、编著小学教育读物、确定小学与大学的分野，其根本原因是为了弥补其“四书”理论体系中“致知”与“敬”的抵牾，以保证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朱熹提倡“敬知双修、诚明两进”皆要主敬，但是大学的道德进修次序却是由格物致知开始，再到主敬的正心、诚意、修身等环节，这样“敬”

的安置就割裂了。于是,朱熹强调在大学教育阶段之前还有小学教育,并将“敬”纳入小学教育中,这样“致知”与“敬”的矛盾便得以解决。同时,它也保证了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基础的道德修养论贯穿整个小学与大学教育过程。这或许是包括“字义体”在内的所有理学通俗化文献产生的重要原因。其二,“字义体”的形成或许是理学家试图与佛道等异端思想相抵抗,以争取更多“信徒”而采取的通俗化手段。比如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各宗派的名相、字音、佛理也颇为复杂,为了保证初学者入门,僧人和居士编著了大量的佛学辞典,如南朝梁宝唱的《经律异相》、北齐道慧的《一切经音》,唐代道世的《法苑珠林》、李师政的《法门名义集》,宋代道诚的《释氏要览》、陆庵善卿的《祖庭事苑》,明代一如的《大明三藏法数》、圆静的《教乘法数》,清代周春的《佛尔雅》等。其他如佛教俗讲变文、颂古等,无不是佛学通俗化的手段,而这些在理学家编著的通俗文献中均可找到相似类型。

然而,在漫长的理学发展史中,“字义体”文献绝大多数已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这究竟是何原因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从学术层面而言,诸类著作实际是朱熹四书学/理学思想以“字义”形式的“复现”,而其最初却是以启蒙教育的小儿书或通俗类的入门书形象出现,故它实难得到正统学者的支持。虽然不乏正统儒者如吴与弼、胡居仁、夏尚朴、李颀等人在平日阅读或学术讨论中引用过^⑥,然而毕竟是少数例证。其二,从通俗启蒙教育而言,虽然其采用“蒙求体”、诗歌等形式,文章言简意赅、易于诵读,但其本质内容涉及艰涩难懂的理学知识。特别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通俗类读物比较,“字义体”显然缺乏普适性、大众性的优势。这大概与绝大多数的理学家没有一线塾师经历相关,因而诸书的授读对象更适用于有一定基础的初学者。简言之,学术研究层面的浅显与童蒙教育层面的艰涩所构成的矛盾使“字义体”文献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并不十分顺畅。

那“字义体”研究的意义究竟何在呢?其

一,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宋元理学家对学派思想的通俗化趋向及向社会传播曾作出的努力。这类通俗类读物根本上是程朱理学从学术领域向下攻占的一种策略,“向下攻占”可分为年龄的下降与阶层的下移,理学家希冀将自家思想向低龄化群体灌输,使个体自小浸润在理学氛围中,同时吸引下层庶民对理学产生兴趣,从而扩大理学的道德教化影响力,虽然其实际结果并不尽如人意。其二,通过对“字义体”的考察,可拓宽儒家经典诠释或儒学的研究思路。比如“字义体”的概念本身是从“四书”中提取,是否可视作一种特殊的“四书”解读形式呢?而且这种体例也影响到对其他儒家经典如“三礼”、《墨子》、《老子》、《荀子》、《周易》的解读,它能否作为一种儒家经典诠释的特殊形态呢?其三,朱子学的传播与影响与其后学的大力传承与发展密切相关,在以“字义体”文献为代表的通俗教育领域中,其门人后学亦无落下,而这条路径常为学者所忽略,有待继续拓展。

注释:

- ① 分别为陈淳《经学启蒙》《初学经训》与《小学诗礼》、王柏《伊洛精义》、饶鲁《训蒙理诗》、程端蒙《性理字训》《毓蒙明训》、胡寅《叙古千文》、朱熹《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参见熊大年辑:《养蒙大训》,《丛书集成续编》(第61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第199—233页。
- ② 《性理字训》是对哲学范畴的解释,《毓蒙明训》是对治道相关字词的解釋,二书体例完全相同。
- ③ 倘若追溯“字义体”的源起,也可从中国字书(字典、词典、辞书)的发展入手,比如朱熹称道《性理字训》为“大《尔雅》”,《尔雅》是中国第一部辞典;美国学者塔克认为《北溪字义》是中国最早的哲学辞典。刘叶秋认为,中国古代的字书分成以文字形义为主的《说文解字》派、讲训诂的《尔雅》派、讲音韵兼及文字训诂《广韵》派。参见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5年,第6页。“字义体”文献虽与辞典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不能列在这三派中,它的特点在于:一是以哲学理学范畴为线索,而非一般字典常用的字词;二是以义理阐释为主,并不涉及字音、形义等训诂要素;三是篇幅均短小精悍,并不如辞典那般卷帙浩繁。
- ④ 目前学界主要针对单本“字义体”文本的源流及思想

进行考察，其中对《北溪字义》的研究最多。参见陈荣捷：《朱学论集》附录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4—334页。张加才：《诠释与建构——陈淳与朱子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有对《训蒙绝句》的讨论。参见白井顺：《朱子学的传播与普及——〈朱子训蒙绝句〉如何被阅读》《人文论丛》2006年第1期，第594—604页。王利民：《〈训蒙绝句〉与朱子学的形成》，《朱子学刊》2000年第1期，第300—314页。其他如《性理字训》《增广性理字训》《训蒙理诗》《伊洛精义》等几乎没有单独研究。许家星对“字义体”整体演变和特征进行分析，虽提及“字义体”的指导思想源于“朱子的童蒙教化”，但行文中未展开论述，也未指出《训蒙绝句》作为“字义体”形成的重要地位。参见许家星：《理学范畴诠释之演变：以“字义”体为中心——兼论朱子后学对朱子学的传承创新》，载陈支平、叶明义编：《朱熹陈淳研究》（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36—466页。笔者主要是从通俗化视角对“字义体”文本的发展及特点进行论述。

- ⑤ 关于《训蒙绝句》是否为朱熹所作，目前学界有异议，朱杰人、束景南、王利民等学者认为此书是朱熹所作，此乃学界主流看法。近来，郭齐与尹波先生认为此书是宋人黄士毅所作。参见尹波、郭齐：《旧题朱熹〈训蒙绝句〉〈性理吟〉之作者考辨》，《文艺研究》2022年第5期，第42—52页。笔者持主流观点，当然，《训蒙绝句》是否为朱熹所作也并不完全影响本文立论。
- ⑥ 关于《训蒙绝句》诗歌的总数问题，明代朱培与清代朱启昆编辑《文公大全集补遗》收录94首，清代朱玉辑《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收录100首，清代郑端编入《朱子学归》为99首。今人束景南以郑瑞本为主并考证认为是98首，本文据此版本。
- ⑦ 79题98首诗中，除“太极图”“先天图”“小学”“西铭”“唤醒”“体用”6个词汇未曾出现于“四书”原文中，其余皆查有可源。
- ⑧ 谭宝焕与尤侗《性理吟》中的哲学范畴完全一样，具体如下：仁、义、礼、智、信、诚、心、敬、性、情、气、志、命、思、意、乐、忧、刚、柔、中、权、几、道、德、四德、四端、格物、践形、皇极、忠恕、中和、阴阳、变化、夜气、谨独、圣、神、人心、道心、明明德、止至善、君道、相道、师道、吏道、求放心、絜矩、干禄。谭氏的诠释以程朱理学为主，尤氏以抒发情感为主。
- ⑨ 我们发现《训蒙绝句》（郑端本）的诗题顺序是按照“学庸语孟”四部编排，每本书内部亦按此顺序，“中庸”“命”“性”“道”是按照《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依次排序。
- ⑩ 宋代“咏史诗”有杨简《历代诗》、赵黻《咏史》、萧立之《开元天宝杂咏》、曾极《金陵百咏》、杨备《金陵览

古诗》《姑苏百题》、华镇《会稽览古诗》、马之纯《金陵览古诗》、王十朋《咏史诗》等。

- ⑪ 宋代对《蒙求》一书的注释、增补、续编、改作比比皆是，如徐子光《蒙求补注》；采用“蒙求”体例编写的著作如历史类：王令《十七史蒙求》、郑德舆《历代蒙求》；道德类和训诫类：邵筭《虞韵孝悌蒙求》、徐伯益《训女蒙求》。有些虽无“蒙求”名，却有“蒙求”之实，如黄日新《通鉴韵语》、文济《左氏纲领》、戴迅《晋史属辞》等。可见，“蒙求体”著作在宋代十分常见，故“字义体”受其影响并不奇怪。
- ⑫ 具体可参见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四，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7—81页。
- ⑬ 陈普在《字义》序中提到其书篇幅“盖多于程正思而少于陈安卿者”。参见陈普：《石堂先生遗集》卷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20页。
- ⑭ “字义体”发展到《北溪字义》已初具学术规范性，但仍具有“初学”“入门”的性质。《读书记》与《四书通旨》对范畴的解释完全超出了启蒙读物范围，二书卷帙繁复，前者106门范畴共40卷，后者98门范畴共6卷，近百万字。同时，二书采用传统的注疏体，前者由字义、四书原典、注疏构成，后者由字义、四书原典、辨析组成。吊诡的是，朱熹等理学家试图将传统经典的诠释简明扼要以启蒙后进，而到真德秀处似乎又重回到了原点。
- ⑮ 朱熹之前，启蒙教育书的数量与种类较少，以识字教材为主，李宏祺指出直到《小学》与《三字经》的完成，“小学道德教育才得以在南宋理学家中完成，其中的演化过程是曲折长远”。参见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第14页。
- ⑯ 如吴与弼(1391—1469)在《太平寺》一诗中说：“连日禅房昼梦浓，人情物理静时功。宵来更拟寻潇洒，净几明窗写训蒙。”其本人所注“训蒙”即指《训蒙绝句》。参见吴与弼：《康斋文集》卷七，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b页。吴氏门人胡居仁(1434—1484)与李梦先谈情与意之别，曾引用此书，“意者，心有专主之谓。《大学解》以为心之所发，恐未然。盖心之发，情也。惟朱子《训蒙诗》言‘意乃情专所主时’为近”。参见胡渭：《大学翼真》卷四，清小西山房刻本，第17a页。胡居仁的门人夏尚朴(1466—1538)，清人李颀(1627—1705)亦曾引用《先天图》《台蒙悦口》与《乐在其中》来解决学术争端。

参考文献：

- [1] 程瑞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M]. 合肥：黄山书社，1992.
- [2] 陈栎. 定宇集：第9卷[M]. 清康熙陈嘉基刻本.

- [3] 张岱年. 略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C]// 张岱年全集: 第5卷.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26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5]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24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6]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1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7]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21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8] 蔡模. 文公朱先生感兴诗[C] //林同. 孝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 [9] 周密. 癸辛杂识续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0] 程端蒙. 性理字训[C] //曾枣庄, 刘琳. 全宋文: 第282册.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 [11]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6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2]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25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3]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4] 永瑢, 等. 四库全书总目: 第95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15] 徐子光. 蒙求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6]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22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7] 汪师韩. 韩门缀学: 第1卷[M]. 清乾隆刻上湖遗集本.
- [18]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18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19]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 第13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20] 陈淳. 北溪字义[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21] 陈荣捷. 陈淳《北溪字义》英译本导言[C] //朱学论集附录二.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 [22] 陈普. 石堂先生遗集: 第8卷[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20.
- [23] 约翰·艾伦·塔克. 《北溪字义》与日本十七世纪哲学辞典的兴起[J]. 张加才, 译. 福建论坛, 1997(3): 46-51.
- [24] 许至. 伦理视域下的宋代蒙学思想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An over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ZiYi Paradigm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XU Zhi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ZiYi Paradigm is compounded by Neo-Confucianist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ith the Four Books as the origin, hence condensing numerous abstract philosophy concepts. It originated from *Xunmeng Quatrain* (《训蒙绝句》) in poetic form, developed in *Interpretation of Neo-Confucian Terms* (《性理字训》) by Mengzhai of the Menqiu style, matured in the *Beixi's Analytic Glossary of Philosophical Terms* (《北溪字义》) of the dictionary style,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Reading Notes* (《读书记》) of traditional annotation-style. It presents the evolving track from enlightening readings, Neo-Confucianist essentials to academic study. This kind of popularized hermeneutics which outlines the Four Books or Confucianism with concepts, and the method of extracting the core meanings in the numerous and tedious thoughts of Neo-Confucianism, not only break the rigid situation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Han and Tang dynasties, but also highlight the essence of typical concepts in Confucianism innovation. More importantly, it provide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way of thinking for the study of Confucian hermeneutic theory, explanation of Neo-Confucianist concept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Confucianism with a lively interpretation form.

Key Words: ZiYi Paradigm; concepts of Neo-Confucianism; popularization; hermeneutic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编辑: 胡兴华]